

为何外国，什么外国

——答《江南》杂志特邀记者问

问：中国的畅销书榜或各个媒体或网站每月或年度推出的好书榜上，占据前几位的、占比例较大的总是外国作家的书。也有些读者和作家或评论家也是言必称外国作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
韩：中国人口不足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。这就是说，如果外国书占中国书市销售总量的五分之四，那么不算太过分，属于正常范围。再说，人们大多是眼睛向上看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会有更多好奇感、窥探欲、攀比心或说追赶心，比如眼下中国每年有大约一亿人次的出国游，主要是去了西方。这大概也没什么奇怪。

问：外国作家的书到底好在哪里？

韩：外国也有不少烂作家，只是被译者和出版者筛选后，大多被挡在翻译门槛之外，不会进入国内读者的视野。外国作家具有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，其作品不但能满足国人的好奇，他们独特的智慧和创造力，还可以对我们大有启发。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卡夫卡、马尔克斯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。在现代化社会转型这一方面，欧美国家先行一步，亚非拉国家各有难题，他们的文学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。不过，“外国”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，应该慎用。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，把它们打成一个包来同中国比吗？其中好些国家几百年下来，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学，他们算不算“外国”？更重要的，文学上从来没有什么是“团体赛”，只有“个人赛”。在有些人想象的“团体赛”中，拿“五分之四”与“五分之一”来比，拿筛选过的与没筛选过的来比，也看不出有什么合理性。

问：是写作技术、思想、艺术抑或营销有道，或者一些国人过分地崇拜洋书有关？如果真好，我们该怎样学习、该怎样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去跟上去？

韩：但凡发展中国家，崇洋媚外都是一种慢性顽症。随便一个楼盘也要叫成“海德堡”或“凡尔赛”或“夏威夷”，无非是提供一种虚妄的身份感。但反对崇洋媚外，并不妨碍国人开放和包容，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，大规模的学习。真正的强者是善于学习的，而且肯定不像崇洋媚外者那样仅仅学一点皮毛，学一点腔调和姿态。比如真正爱好外国文学的，最好先过外语关，直接阅读原著。福克纳《喧嚣与骚动》在时态、位格等方面做的手脚，没有对应的汉语表达方式，你在翻译本里怎么读得到？海德格尔或昆德拉的一个 Being（在，是，存在，生命等），你如果没有西语修养，还免得了一知半解？……这样说，是立一个较高标准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他们通过翻译本对外国文学了解一个大概，也就可以了。

就像他们去国外，不能在那里工作或学习，不能在那里摸爬滚打，只能住在宾馆里观光几日游，也聊胜于无吧。但翻译本是一种仿造，有时候变形还很厉害，不能过于信任的。同其他行业一样，优秀翻译家不会太多，但二、三流翻译家也要吃饭，还出手很快，蛮拼的。他们在选题时常常看走眼，在语言转换时有时缺斤短两，甚至化宝为废，点金成石，惨不忍睹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培养更多综合素质优秀的翻译家和有关出版家，是我们加强对外学习的起码条件。

问：我们反对一概而论，但我们如果对照外国的作家的书，看看我们的通常的弱点和缺陷也是好的。如果你有点滴体会，也请分享：你看到的我们的书的缺陷有哪些？

韩：不说“外国”，说欧美吧。个人主义在那里有很深的传统，宗教和现代科学在那里也有很深的传统，这些在文学上都有所表现，滋生了很多特别的思潮、手法、样式、风格。比如，长期以来心理描写是他们的长项，这可能与宗教有关，与“灵魂”的概念、忏悔的习俗等有关。既然以个人为本位，那么他们写恶，写性，也就有了自由的合法性和大尺度。但这件事放到一个群体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语境里，比方中国这样的国度，文学需要顾全大局，更多一些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，写恶与写性，就必然要节制、含蓄得多。看看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词、小说、戏剧，想想儒家诗教的“温柔敦厚”，就不难明白这一点。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养一方文学。在另一方面，欧美在工业化、都市化进程中超前许多，相关生活经验多出了一大块，文学也必然应运而变。离婚率、同性恋、孤独感、精神病……这些东西不成为他们的经验优势和题材优势，也不大可能吧？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读者，追逐各种现代元素，寻找他们的“高大上”和现代人生指南，不去那里又去哪里找？我们不必拿白菜同萝卜比，不必用一个民族的标尺去衡量另一个民族。但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，文化正在大规模杂交，国人也正在遭遇欧美人近似的生活难题，那么注意他们的观察和表达，洋为中用，博采众家，实行鲁迅的“拿来主义”，增加一个民族的活血，当然是很有必要的。

问：我们的书有哪些优长？有哪些可能突破的地方？

韩：我不会算命，也不是比较文学专家，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。硬要说的话，以一个读者身份，从极有限的文学阅读范围来看，中国人起码在人物描写方面，还算是功夫了得的。像《史记》纪传类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放到同时代的西方，几乎无与伦比。再说一条：就文学的基本工具而言，汉语不仅有四声结构，而且以字组词，十分灵活，变化多端，其音乐感和画面感，虚实转换的方便，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奇货可居——只是很可惜，基本上没法翻译出去。掌握双语、多语的国人，还有粗通汉语的外国人，都能知道这一点。

问：中国书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影响究竟如何？

韩：还很小吧。如果把中国也算作“国际”的一部分，也不算太小，但中国在当代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经济学等方面还缺乏引领世界潮流的实力，这是事实。国人还得多多努力，包括力戒浮躁，精通专业，开阔眼界，释放创造力。

问：当然，书也分多类，有文学，有学术，有艺术，文学里又有通俗与严肃之分，乃至现在的小说，也有“文学小说”的叫法。我们的各类书该从外国书那里吸取哪些可操作的模板？我们的不同类的书怎样才能占有一些话语权力？

韩：“可操作的模板”？我不知道，完全没法说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在这方面也是众说纷纭，没找到通用的灵丹妙药。西方不少同行其实也在抱怨眼下的出版商们唯利是图，说冷战结束以后文化滑坡，文学低谷，精神白痴化，遍地泡沫和垃圾……他们的牢骚和忧患一点也不比国人少。很多人甚至痛恨“能见度”“话语权”“操作模式”这一类概念，认为这些正是市场化的可恶产物，体现了权力与资本对文化不正常的压迫，是这个功利社会和浮躁时代的表征之一。All is for sale(一切都是为了卖钱)，是这样吗？至少几千年下来，孔子、老子、孙子兵法不是为了卖钱，孔子还曾穷困潦倒如“丧家犬”。唐诗宋词当初也多是抄给亲友们看一看，没赚过什么版税，没地方好卖。至于将来，文化被市场化一网打尽的可能也十分可疑。眼下，西方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声音日趋高涨，比中国要响亮许多，也许这恰好是我们应该了解的“外国”的一部分。

问：外国的畅销书榜或好书榜通常是怎样一个结构？国内和国外的比例如何？

韩：我从不关心这个，包括国外的排行榜。我总是靠朋友推荐来买书和读书的，相信这些朋友比书商们更靠谱。

（又可整理，2015年7月）